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逢振 主编

詹姆逊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Fredric Jameson

第7卷

语言的牢笼

钱佼汝 朱刚 译

Fredric R.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逢振 主编

詹姆逊文集

第 7 卷

语言的牢笼

钱佼汝 朱刚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姆逊文集. 第7卷, 语言的牢笼/王逢振主编; 钱佼汝, 朱刚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0-16407-6

I. ①詹… II. ①王…②钱…③朱… III. ①詹姆逊, F.-文集②结构主义学派-文学评论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1829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詹姆逊文集 第7卷

王逢振 主编

语言的牢笼

钱佼汝 朱刚 译

Yuyan de Laolo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9 插页 4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1 000

定 价 1380.00 元 (全 14 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译者前言

《语言的牢笼》是詹姆逊较早的一部专著，发表于1972年，和前一年出版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两部论著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它们在内容上评述的却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传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两套迥异的概念和术语以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还比较陌生。虽然维克托·埃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早在1955年就向美国和英语国家的读者详细介绍和评价了这一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但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除早已移居国外的人如雅可布森等外）的主要论著却一直要到60年代中期之后才陆续译成英语，且以单篇文章居多，种类也很有限。结构主义的情况可能稍好。1966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的科学”学术讨论会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带到了美国，但当时能加入这场讨论的美国人不多。法国结构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和详细介绍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论的专著到7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出现。

介绍结构主义的书大致有三类：一是论文集，如雅克·埃尔曼所编《结构主义》（1970）、迈克尔·莱恩所编《结构主义论文集》（1970）和戴维·罗比所编《结构主义引论》（1973）；二是以介绍为主的专著，较突出的有罗伯特·斯科尔斯的《文学中的

结构主义》(1974)和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1975);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则属第三类,它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框架在思辨的层次上对结构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的观照。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詹姆逊认为,“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他还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才能〕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

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确实这样做了。他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或曰“思维模式”,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头钻进去的。他的“指导思想和自始至终的任务是澄清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并对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这些领域中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作出评价。

众所周知,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富独创性的是,他明确提出的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组合和聚合这四组区分以及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的双项对立方法论。詹姆逊对索绪尔的理论的评价是把它放在和英美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语言观的比较中进行的。他首先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就其彻底摆脱英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论这一点而言,是值得肯定的。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学恰恰是一门以没有……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在语言中却只有差异,没有可从正面肯定的东西”。詹姆逊认为,这种强调相互关系而不是实体的思想是辩证的,因为它可以靠系统内部的关系产生意义而无须像瑞恰兹和奥格登的理论那样到系统外面去找指

涉物。这就是说,“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 and 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

然而,索绪尔的理论也暴露出许多固有的缺陷。詹姆逊指出共时和历时这一对区分索绪尔的理论的支点。当初,索绪尔提出共时概念,针对的是赫尔曼·保罗的唯历史研究是科学的观点,意在扭转这种偏向。不过,詹姆逊认为,把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对立、共时和历时相对立的做法“同样是武断的,其方法论的前提也是一种同样武断的价值判断:‘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意义,它就必定是共时的’”。在詹姆逊看来,共时和历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他所举的一系列例子都想说明这一点。“尽管索绪尔的理论中暗含的历时模式,突变的理论,能够对历史变化作出复杂的和有启发性的生动解释,但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把历时和共时在同一个系统中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根本问题”,因为索绪尔把它们看成“一种纯粹的对立,是一对永远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面”。双项对立正是这样一对对立。詹姆逊认为,“这种双项对立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法中的对立,更确切地说就是矛盾,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静止的对立,不像后者那样与自身以外的东西发生联系”。于是他甚至怀疑在这些永远互不相干的对立面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什么系统。即使能够,这些系统也只能让你看到它们所依赖的模式允许你看到的東西。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局限性概源于此。

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评述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中有哪些体现,二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本身有哪些无法摆脱的困境。

20 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几乎同时经历了一场反传统的思潮。在语言学中,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强调即时和整体

的共时语言学对以新语法学派为代表的强调历时和个别的历时语言学的反抗；在文学研究方面，则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对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波杰布尼亚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批评。这两股潮流的共同特点，用詹姆逊的话来说，就是“分离出事物的内在因素本身，将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这样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系统，文学研究则应以“文学性”为对象。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主要是形式的问题，通过“陌生化”的手段而获得，而形式又主要是语言问题，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诗歌语言是日常语言的一种变体，是“对普通语言有组织的暴行”的理论，以及作为陌生化这一手法的心理学基础的“自动化”和“非自动化”的对立都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关于差异和双项对立的理论，即在差异中寻求自身，在否定中确立肯定。这样，正如语言学中意义的确立需要同时考虑在和不在的因素，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的概念必须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的两个方面，陌生化也必须要有不陌生为其存在的前提。詹姆逊还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诗歌与散文不同的陌生化方式，即通过选择改变个别成分的“微观”陌生化和通过组合改变排列顺序的“宏观”陌生化，特别是普洛普的叙事理论中的纵横两个结构层面的理论，都和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有密切关系。此外，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的演进不是连续的发展而是断续的取代这种文学史观，和索绪尔的共时理论中暗含突变的思想也十分相似。

陌生化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也集中于此。首先他认为，“只有事先存在的东西——实物、习俗、某种类型的单位——才能被陌生化，这就像

只有本来有名称的事物才能失去它为人所熟知的名称，并突然在我们面前变得令人吃惊的陌生”。那么什么是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事先存在并已为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呢？答案当然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然而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者不仅一贯排斥内容，而且总是将一切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所以“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著述中从来也没有说清楚被陌生化的到底是内容还是形式”。詹姆逊认为：一切艺术都多少会让人有新鲜感，但不是所有的艺术都会像什克洛夫斯基所推崇的斯特恩的《项狄传》那样把“暴露”自己的“手法”作为自己的全部内容。因此《项狄传》没有典型意义。陌生化作为通向文学性的唯一道路也是站不住脚的。那种认为文学作品表面上有指涉、有内容，实际上谈的是自己的形成、自己的结构的看法才真正是幻视。这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一大错误。

詹姆逊对法国结构主义的评述占全书一半以上，显然是本书的重点。他首先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虽然都源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却不尽相同。结构主义更关心的是形成系统，建立模式，强调整体性。结构主义者认为，实物或表面现象的历史这种观念已经被模式的历史这一观念所取代，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自觉的思维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模式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并且……是由该模式决定的”。詹姆逊认为，这一转变“和整个科学的中心内容的历史转向相一致……〔而〕科学上的这种从感性认识到建立模式的逐渐过渡符合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转变”。由此可见，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

要对结构主义这样一个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并产生出不同理解的哲学问题进行评述，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宏观上，詹姆逊把结构主义理论放在上层建筑

和基础结构对立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中加以审视，认为结构主义研究的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但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对基础结构的研究。微观上，詹姆逊“按照符号本身的内部结构……区分三种不同的研究：主要针对能指的组织的研究，以所指为对象的研究，最后还有试图单独提出指意活动本身，开始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初步关系的研究”。詹姆逊把主要力量放在微观研究上，用大量篇幅分节探讨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人类学，阿尔都塞和福柯的社会历史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巴特的符号学，格雷马斯的语义学，托多洛夫的叙事学，《泰凯尔》（见本书134页注）的文学批评，还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关能指/所指、共时/历时双向对立的理论在这些领域中的体现。

正如在评述索绪尔的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时强调历时和共时不可分一样，詹姆逊十分强调能指与所指也是不可分割的。他批评了割裂二者的做法，因为“我们最终不可能用任何在方法上或概念方面有意义的办法使所指脱离能指”。詹姆逊特别指出结构主义强调能指，强调系统的内指性所造成的后果：即尽管“所有的结构主义者，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及其对自然的认识、巴特及其对社会和思想问题的关心、阿尔都塞及其历史意识，都承认在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可被认识，都起着符号系统的最后参照物的作用”，他们却坚持类似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存而不论的“悬置”方法，拒绝指涉物的介入。詹姆逊认为，“这不仅是我们从外部对结构主义所作的一个评价，而且也是它自身的一个矛盾，因为它的关于符号的概念不允许我们对它外面的现实世界进行任何研究”。这种现象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反映就是一味排斥内容，或混淆内容与

形式的界限。詹姆逊说，“结构主义独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自我或者主体当作实体”。只有这样，它才能避免将外部内容引入纯粹表示关系的系统中，才能避免进行解释，最终使结构主义的形式（语言模式）又转变为一种新的内容（语言成为最终的所指）。因此，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结构主义批评的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变”，这样，“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都通过自己的情节结构讲述自己构成的故事，自己的历史”。于是“在结构分析层次上又出现了形式回归到自身的现象和我们在形式主义批评中看到的那种荒谬的自我指定：形式主义批评将作品的形成看作自己最根本的内容，而现在结构主义者又把一部作品的内容视为语言本身”。詹姆逊认为，“这并不是个别批评家的偶然所为或独有的癖好，而是这个模式自身固有的一种形式扭曲”，所以“最好把结构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是现代哲学中无处不在的那种脱离具体内容，脱离各种能指理论的普遍趋势的极点”。

最后詹姆逊又回到宏观审视上，从认识论的高度回顾语言模式这个根本问题。显然，“一种哲学如果自身不包括有关其自身特点的理论，如果不在意识到它所涉及的对象的同时也给某种起码的自我意识留有余地，如果在认识它应当认识的事物的同时不对认识自己作出某种基本解释，那么它必定落到画了自己的眼睛还不知道的下场”。结构主义虽然是一个强调内指的系统，似乎应该有一套自我意识的理论，可以用元语言来谈论自己，然而詹姆逊却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模式是一个“在结构上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理论的体系”，因为语言符号的所指的“无穷退行”“表明有一种最基本的对象语言是评论的语言永远不可能企及的，这种对象语言就是语言本身”。因此，“用各种语言系统来说明现实，用新的语言学术语来重新表述哲学问题，这一选择必然是一个专断

的决定，必然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享有特殊地位的阐释方法。……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一切皆语言的观点无可辩驳，但也无法辩护”。我们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符号和指意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

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评价是有倾向性的，但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这主要表现在方法上，詹姆逊并没有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的做法，而是钻得很深，对这两种理论的积极一面给予充分肯定，对它们固有的缺陷则进行尖锐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对结构主义的评述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詹姆逊也许钻得太深了一点，超出了当时广大读者的接受水平。这也是这本书不及卡勒的《结构评论诗学》那样普及的原因之一。书中，詹姆逊多处将对结构主义的评论引向社会层面，与垄断资本主义向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相联系，预示了詹姆逊后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其著述中反复论述的一个重要思想。

本书第二章为朱刚所译，由我审校。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和德语专业部分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本书涉及面颇广，部分概念、术语尚无可资借鉴的译文，原著的文字也较艰涩，加上译者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钱佼汝

如果我们拒绝在语言的牢笼里思考,那我们就只好不思考了;

因为我们最远也只能走到怀疑我们所见到的极限是否真是极限这一步……

尼采

序 言

思想史是思维模式的历史。经典力学、有机体、自然淘汰法、原子核或电子场、计算机等，这些都是最初用于总结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后来又用来说明人类世界的许多的实物或理论体系中的几个例子。

任何一种模式的一生都表现出一种有规律可循的节奏。开始的时候，新的观念释放出大量新的能量，产生许许多多新的观点和新的发现，并引发出一大堆新的问题，从而导致大量新的工作和研究。在整个初始阶段中，模式本身保持稳定，主要提供一种思维方法，使一种新的宇宙观得以形成并载入史册。

在模式生命的暮年，相对来说要花较多的时间来对模式本身进行新的调整，使它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再次协调起来。这个时候的研究往往偏重理论而不是实践，往往抛弃自己原来的一些预设（模式本身的结构），为日益陷入模式的缺陷所导致的谬误和困境而感到苦恼。这使我们想起以太或集体意识这样一些例子。

最后，老的模式被新的所取代。本书所涉及的某些思想家曾把这件大事称为“突变”（这本身就是用一种模式来比喻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的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这一取代尽管无法像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实践或出版一部关键性的著作那样清楚地说得出具体的时间，但它标志着一次决裂、一件事情的彻底结束和另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的开始。此外，就像不满旧的范式的人无法靠苦思冥想凭空臆造新的范式一样，新的模式看来也是无法有意识地准备的。

上面所说的这一过程正是有机体模式的历史。这个把有机体

作为原型的想法曾像星星之火，一下引发出整个浪漫主义哲学和19世纪的科学思想。有机体这一概念的优点在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方面在它身上得到了活的结合，更确切地说是尚未分家，因为正是历时研究（对有机体渐变的观察）把观察者的注意力引向共时的结构（那些经过衍变的器官在有机体身上同时共存的情况）。于是，诸如“功能”这类概念便出现在这两个方面的交叉点上；有了它们，历史才能自称是一种有权独立存在的认识方法。

然而有机体模式后来过于依赖实体论思想。如果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事先确定的独立的实体，它就虚构一些实体来满足方法上的需要，各种社会或文化方面的有机论都有这个毛病。在对这种实体论思想的反拨中，在“场域”理论或关系理论的各种形象中，最彻底的就是现在提出的这种把语言作为它的基本模式。

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奇怪的倒是过去竟不曾有人想到这样做过，因为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样来描述结构主义等于承认它在重蹈哲学史的老问题的覆辙，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甚至是黑格尔之前那些我们今天已无须再操心的思想窘境和谬误之中。不过，正如我们下面要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意见对结构主义的根本矛盾来说较为中肯，而对其具体的一般任务却不尽然。后者以语言的组织和状况为其内容，它提供一批新的材料，使老问题以新的、未曾预见过的方式重新提出。因此，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我个人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

这当然不是说结构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即把语言模式放在首位，就和我们即将谈到的思想困境毫不相干，因为这一出发点为了显得有特色，同样有任意性，而且由此产生的思想方法也不可避免地要对自身形成和存在的前提最终作一番痛苦的，但未必能解决问题的反省。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方法自相矛盾之处。这种思想试图找出构成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元素，例如水或火，结果却发现水或火的构成又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毫无疑问，今天当我们说一切归根结蒂都是历史的、经济的、情欲的或者是语言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现象骨子里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原材料构成的，而是说可以用这些不同的方法对它们加以分析。

然而，这样说也会产生类似的矛盾。我们总以为把语言学的方法用于文学研究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文学本身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结构。但是老的文体学，也就是施皮策^①和奥尔巴赫^②，或者是稍近的J. -P. 理查德^③所从事的那种文体学，却更多地作品本身的文字结构上下工夫。最后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把文学作品视为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用了一个比喻。

这种辩证的颠倒在语言结构的外缘也有所表现。譬如我想到了格雷马斯^④把他的结构语义学的研究对象说成是一种“意义效应”这个例子；似乎在把一切意义都当作我们的研究对象之后，我们就再也无法从指意本身这个角度来谈论它们，好像不得不置身于意义这个领域之外才能确定它们之间在形式上有哪些共同之处，而不论其内容是什么。

① 施皮策 (Leo Spitzer, 1887—1960)，奥地利语言学家，1936年移居美国。

② 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 1892—1957)，美籍德国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模仿：西方文学中现实的表现》(1946)详尽地论述了自荷马至普鲁斯特的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观的变迁，为西方比较文学经典著作之一。

③ J. -P. 理查德 (J. -P. Richard, 1936—)，美国文体学家。

④ 格雷马斯 (A. J. Greimas, 1917—1992)，法国结构主义语义学家、叙事学家。主要著作有《结构语义学》(1966)、《论意义》(I：1970，II：1983)等。

结果，内容的表达反而要以印象为其形式；到头来，明明是一个智力结构的理性问题，我们却只好用思考时“感觉如何”这类话来说明它。

我认为，用语言作模式或以语言为比喻的更为深层的理由必须在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是否代表科技进步这些问题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实际上，它就在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具体性质之中。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像：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噩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对各种新的语言学门类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甚至也没有想过对所涉及到的那些潮流的发展作一个以主要事件为线索的历史的综述。有关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这种综述，已经由维克托·埃利希^①在他那部权威性的《俄国形式主义》（海牙，1955）一书中给懂英语的读者作出。该书记述了俄国形式主义从一批研究语言学 and 文学的学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聚会开始一直到它在灾难性的1929年丧失举足轻重的论战力为止这段时间内的命运。

关于结构主义却没有一本可与《俄国形式主义》相匹敌的著作。结构主义，为了方便起见，可以说是从1955年列维-斯特劳斯^②发表其《悲惨的热带》一书起发展成为一场“群众运动”的；

① 埃利希（Victor Erlich，1914—2007），美籍俄国学者、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主要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1955）为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公认的最全面的权威述评。其他重要论著有《果戈里》（1969）、《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批评》（1975）等。

②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神话学家、哲学家。他首先将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原则应用于神话和人类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要著作有《悲惨的热带》（1955）、《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结构人类学》（二卷本，1958、1973）、《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2）等。

(在经过 1960 年《泰凯尔》杂志的创办和 1962 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蛮人的心智》的发表这样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之后,) 结构主义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可以说达到了某种顶峰; 这段时期内同时出版了拉康^①那部传世的佳作《文集》和德里达^②的三部巨著。至于“结构主义”这一术语, 我是从把语言系统作为一种比喻或模式这一做法的最严格和最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它的, 因此它不适用于让·皮亚杰^③或吕西安·戈德曼^④, 因为他们两人都借用过这个词来为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 它和美国某些社会学流派对这个术语的用法也没有任何关系。我还应当补充的是, 我在本书中有意不涉及尤里·洛特曼^⑤和他的同事们在塔尔图大学发展起来的苏联结构主义的极为丰富的内容。

我的计划是对这两股潮流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同时也可以说

① 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提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重新解释, 认为无意识的结构像语言, 主张从语言学、人类学、符号逻辑等角度进行精神分析研究, 其理论晦涩艰深, 令人费解, 但对文学、哲学、语言学均产生极大影响。主要作品收入《文集》(1966) 中。

②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法国哲学家,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反对和批判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思想, 有怀疑主义色彩。主要著作有《语言和现象》(1967)、《写作与差别》(1967)、《文字学》(1967)、《撒播》(1972)、《哲学的边缘》(1972) 等, 涉及自柏拉图至胡塞尔的西方哲学中有关意识、存在、意义、认识等问题, 在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有很大影响。

③ 皮亚杰 (Jean Piaget, 1896—1980), 瑞士心理学家, 主要研究儿童思维和心理发育过程。主要著作有《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三卷本, 1950)、《儿童早期逻辑发展》(1964)、《结构主义》(1968) 等。

④ 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1913—1970), 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原籍罗马尼亚。深受卢卡奇、皮亚杰影响, 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创造者, 主张从历史、社会根源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与作者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主要著作有《隐蔽的上帝》(1956)、《人文科学与哲学》(1952)、《小说社会学》(1964)。

⑤ 尤里·洛特曼 (1922—1993), 苏联符号学家。主要著作有《诗歌文本的结构》、《文化类型学》等。